

戰期新聞新間宣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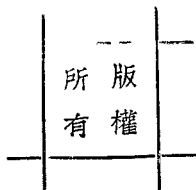
任白濤著

任白濤著

抗戰期間的新聞宣傳

新聞研究社刊行

一九三八年五月初版



抗戰期間的新聞宣傳

實售二角

著者 任白濤

出版者 新聞研究社

經售處

北新書局駐粵辦事處

廣州多寶路多寶街十九號

目次

開頭的話·····	一
第一章 戰爭與宣傳·····	六
第二章 抗戰期間的新聞宣傳·····	一八
一 首先要反敗北主義·····	一八
二 戰時新聞宣傳的要諦·····	四二
三 抗戰時期所必需的新聞報導·····	九二
1 關於我方的·····	九二
2 關於敵方的·····	九六
結尾的話·····	九九

抗戰時期的新聞宣傳

開頭的話

八一三抗戰發動後不久，老友W君主持××日報編輯事務。一天，他來我寓告知此事，並且向我索討關於戰時消息的蒐集、取材及登載的方法。我因為這問題真活像一部二十四史，有無從說起之感。於是權就當時對面諸耳聞，老實不客氣地告訴他：若是你想出晚刊，那末可於發稿前在報館裏隨便參攷幾種早報的戰事記載，並注意前一日的天氣狀態。比如前幾日的天氣是很晴朗的，並且正值有月亮的時期，那就不妨使用

什麼「記者於昨晚乘汽車往戰地視察，在月光照耀的不平的公路上，一顛一覆地駛着……」這種筆調，去寫長篇的戰地視察記事。若是你想出早報，那就更其方便，就是只要把晚報上的新聞記事連標題一古腦兒剪下，便得；這種晚報登過的新聞，不但可用到普通的新聞版，即使在「最後消息」欄，也是可以填塞進去的！W君笑了；但是他不相信竟有剪取晚報的電訊填塞「最後消息」欄的，我就給他舉出證據，說明這還是很出風頭的某小型報玩的把戲哩！

上一段話，雖然有點像「遊戲文章」的氣味，但其實話的反面在含蓄着十分深刻的意義。但這僅是就編輯採訪的一部分技術的立場說的，還絲毫沒有說到理論的方面，即絲毫沒有說到什麼材料是可取的，什麼材料是

不可取的，以及登載——特別是做新聞記事的主腦部分的標題——的方
法。的確有如上述，對於這問題在倉卒間實無從說起並且決不是三言兩語
所能說盡的。隨後，W君囑我寫點關於這類的千字左右的短篇文章，無奈
仍是因爲上述的理由，更兼爲整部頭的工作所累，所以終於未能在該
報上發表這種千字左右的短文；另一個未發表的原因，就是W君不要『檢
討文章』，理由是在抗戰時期自己不檢討自己，卽如某小型報剽取昨日晚
報電訊填塞『最後消息』欄內這一個十分顯著而且關係重大的事實，便是
不願登載的一種『檢討文章』。其實，在平時，我們對於報紙上的錯誤，
大可一笑置之；但在戰時——尤其是在對抗外敵侵略的民族解放的戰時——
因爲對於一切事物，都應像戰場抗敵的機關槍手的動作一樣，要用極爽

利的方式來一個新的清算和估定，而對於有關戰時宣傳者很大的報紙，更不可隨便忽過。即戰時的報紙，在宣傳上，一有疏忽之處，那在戰地的將士和後方的民衆，都要感到利害的影響，決不僅是報紙的編輯取材的技術上的錯誤問題，換言之，不是單只關係於報紙本身的問題。

從以上所說，轉到這本小冊的內容：既如題名，是『抗戰時期的新聞宣傳』而不是『抗戰時期的新聞檢討』，那末當然仍不來檢討了。決乎不然，即要想就理論上、技術上申說抗戰時期的新聞宣傳的妥當方法，必須指出什麼是不妥當的方法；換言之，能夠說出什麼是不妥當的新聞宣傳的方法，自然會有妥當的新聞宣傳的方法來做陪襯。這樣說來，檢討也是不可少的。當然在這本小冊上，要想檢討過去和現在的新聞宣傳上的毛病，

是決乎檢討不完的；只有把極關重要的事例舉出數則來檢討，來分析，來說明，也大可以包括住其餘的一切了。

在鳴君的戰時宣傳工作的檢討一文（註）的首段中有云：「……敵人關於我國情的諜報，那詳盡的程度，遠非我老百姓所能審悉萬一。……我上下應本血誠，深自反省的。現在全國戮力，共赴國難，當無暇互責，但凡有與戰事直接痛癢相關的，自應披瀝相告，冀謀補苴……。」這本小冊子的用意，也就在此。

（註）詳見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申報時評欄。

第一章 戰爭與宣傳

宣傳是在我方和敵方對立的戰爭或類似戰爭的時候最通用的手段。先就西方來說利用宣傳到戰爭上的最古的事例，據說是『波斯戰爭』時期希臘名將塞密斯托克利斯 (Themistocles) 的宣傳方法。即波斯王統率的海軍所以終於在薩拉密斯灣 (Salamis) 覆滅者，也是塞密斯托克利斯對愛琴海 (Aegean Sea) 諸島民的排波宣傳的效果。即當波斯王的船艦歷海大舉攻到時，愛琴海的諸島民好像互相約定一般，拒絕食糧和淡水的供給，遂使波斯軍受了致命的打擊。

在普法戰爭時，俾斯麥和普帝怎樣地破格優待——其實是籠絡——倫

敦泰晤士報的軍事記者拉塞爾 (W. H. Russell) 已早在拙著應用新聞學 (頁一七三) 上說過。

當歐戰後，德皇威廉二世曾向人說過德國之敗，不是由於軍事，而是由於沒有泰晤士報的話。雖然這話有點過於謙虛，即有意掩飾德國在戰時所作的種種虛偽宣傳。但也可以證明英國的對敵宣傳的巧妙；更換言之，德國之敗，不是敗於軍事，而是敗於宣傳。原來，在歐戰中的一九一八年，當時的英國政府除在內閣正式地設置報導部長 (Minister of Information)，企圖一切新聞報導的統一調節，任命英國報王之一倫敦快報公司總理畢弗勃洛克 (Beaverbrook) 爵士担任此職之外，並設對敵宣傳局，以報王之一北嚴爵士為總裁，用極有組織的方法，運用戰時的對敵宣傳。

這個英國的對敵宣傳，因爲是以政治家克魯爵士（Crewe）的邸宅做其本部，所以有『克魯邸宅的宣傳』的名稱。這個對敵宣傳，主要地是利用氣球把多量的傳單散布到敵國的內地；同時，英國的許多報紙也拿這種宣傳的內容做新聞、做意見而公表出來，遂在那個宣傳的本身上更加上一層的效果。這樣，宣傳與報紙，算是完全打成一片，雖然有人反對說這妨礙着報紙獨立自由的立場，但終於爲了敵國外患的利害，反而不能不認報紙登載這種對敵宣傳品是一種愛護國家的行爲。

克魯邸宅的宣傳，照着預定的計劃，一一實行，僅在數個月間，便收得很大的效果：先使奧地利的戰線自己消滅，繼使興登堡的戰線退却，不久便見着停戰的結局。——至關於克魯邸宅的宣傳方針，據做過該宣傳本

部副總裁的斯丟阿特(C. Stuart)所著的克魯邸宅的祕密(Secrets of Crewe House)一書之說，是這樣的：

『所謂宣傳，是能誘導某種事物的方法的表現。它的第一目的，便在造成良好的空氣。所以宣傳對於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局面的發展，以及關於敵國民的心理狀態的事實，必須立到廣汎的知識上頭……因此之故，宣傳第一要則是單只照着真實來宣布；第二要則是在宣傳裏面不可有矛盾撞着的事情。因之，必須嚴重遵守所定的政策，希求總體的最堅固的協同。玩弄虛偽，會招致難以回復的失敗！』

敵國(德)……宣傳的失敗，便是在戰爭應於短期間終了預

想之下，拿不真實的、半虛偽的、錯誤的、誇張的等等事情做宣傳的資料；爲這，雖然收得一時的效果，可是隨着戰局的拖長，便逐漸顯出自身上所被的假皮來；想着幹得很妙，可是反而成了害毒。」

據說這是不偽的告白。也許這個克魯邸宅短期間的宣傳，都是真實的；但在此期間以前數年的英國對敵的宣傳，便決乎不能說盡是真實了。的確，要說上次的世界大戰，是由英國的新聞宣傳而得到勝利，實非過言。與戰爭開始同時，把德國人的殘忍、無人道而等於獸類這樣的觀念，幾乎都深深地打入全世界人的頭腦中，便是英國的宣傳的結果。比如在英國第一次工黨內閣的外交次長彭遜比(A. Ponsonby)的在戰時的虛偽(Falsehood in War-Time)書中之說，當時英國爲了煽起其它國民的敵愾心理起見，盛事

宣傳德國兵的慘虐，如什麼德國兵切斷兒童的手腕啦，對紅十字會的女護士施以暴行啦，以及德國用戰地死屍作材料來製人造白塔啦這一類宣傳，幾乎盡是虛偽的事情。又，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間，路透社總經理瓊斯爵士 (R. Jones) 來華，後來由滬赴北京，於二十九日應顏惠慶之宴，席間瓊斯演說，在表示對於中國新聞界的希望之後，講到新聞宣傳，他首先指摘從無線電廣播中傳來的新聞，有『從末有不售價的新聞而能免除宣傳作用者』的警句，隨後說到自己，他很老實地說：『關於宣傳一層，余個人曾為宣傳……。當歐戰期中，余為英國政府担任宣傳。此猶之毒氣炮、炸彈等等戰品，在急欲制勝敵人之際，不得已而用之。大戰一終，宣傳作用即當隨毒氣炮、炸彈等而俱去，不應重演於世界和平之日……。』這又可

作當時英國從事虛偽的新聞宣傳的確證。

在前述的彭遜比的著作中，還暴露出當時的法、美、德、意等國的虛偽宣傳；內中關於法國的宣傳，是從以『法蘭西的一主筆』的假名而著的法國新聞事業的裏面的書中引出一節。大致是說法國在開戰的第三天，便着手去做有力的宣傳工作，投二千五百萬金法郎的巨費，設戰時宣傳本部，而得到兩院的通過。這個戰時宣傳本部設在巴黎佛朗索街三號的、有地下室的五層樓房。在地下室裏，裝置各種印刷機器，底層有大會議室。那兩百個房間，都成了做宣傳工作人員的事務室或會客室。即從地下室直到五層頂上的玻璃房子成了一個宣傳的總體。頂上的玻璃房子，是照相繪畫室；裏面除放置些木製的被殺的人的胸體、手、脚或眼睛被貫穿的傀儡

之外，還有專門畫家在室的一隅繪畫被爆炸的教堂和被發掘的古墓，以及荒廢的村落的情景。這些木偶和繪畫，不消說都是爲達宣傳的目的起見，當作一種珍貴的證據，要對全世界的民族暴露德國軍隊的慘虐來使用的。所以這座房子，實在是最有力的虛偽的戰報或從前線和後方發送製造出的新聞的不斷的源泉。並且這個虛偽宣傳是經過政府當局的檢查而受了強制的行爲。又，這種行爲當然要利用發行迅速的報紙；唯一的宣傳方針便是把敵方的真實當作絕對的虛偽，把己方的虛偽當作絕對的真實而傳佈出去。

次說東方：在中國古代，所謂『戰車千乘，兵甲百萬』就是一種有力

的軍事宣傳；又所謂『流言蜚語』這種文句，也可說是宣傳的一種。

清日戰役日本所以倖勝，倭將兒玉，在返國後的某次公式宴會席上，竟讓其功於報紙的宣傳；又在當時的日本從軍記者之一松井柏軒所著的四十五年記者生活中的記清日戰役處的第一節，更有『用報紙攻略旅順』的題目；這些雖然有點過獎和誇張，但一考諸實際，確也有結實的憑證。再從另一面說，清軍所以戰敗，其背後沒有報紙的宣傳，也是一大原因。

在近代中國，如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和一九二六年的革命的所以成功，報紙宣傳之力，不僅可說不在炮火之力以下，也許可說在炮火之力以上；尤其是後者，因為受過先進國的宣傳專家的有組織的訓練，所以不但把新聞宣傳同軍事宣傳連成一體，並且把宣傳攻略和炮火攻略連成一體。因

此，那時的日本報紙，記述這種宣傳的行動，都驚訝的了不得。的確，這種進步的軍事宣傳方法，也可說是東方數千年的歷史上所不會看見的。

照以上所述，宣傳對於戰爭，是同炮火一樣要緊的事情。更申言之，在近代的戰爭裏面，必須要有三戰線的協調一致：第一是軍事戰線；第二是經濟戰線；第三是宣傳戰線。但這種次序也只是爲圖行文的便利起見，其實，三條戰線同一重要；尤其是這條宣傳戰線，實在可說是近代世界戰爭的一大特色；與戰事的規模振古無比同樣地，這種宣傳的規模也是空前的。照專家之說，戰時宣傳的目的，方法，大致可區分爲四種：（1）煽起自國民對於敵國的敵愾心；（2）努力維持與同盟國的友情；（3）保持與中立國的友情，儘力使它參加到己方；（4）阻喪或減削敵國民的志氣和敵軍

的戰意。

只是有個應注意的要點，就是對敵宣傳，必須依靠真實的憑據；像歐戰時各國那樣地以敵方的真實爲絕對的虛偽、以己方的虛偽爲絕對的真實的方法，即專門造作謠言的方法，是不足取的；而且就現今來說，那些方法，也都可說成了過時的貨色；不但效果很少，並且足以長敵方的氣燄，餒己方的意志，放在現今，更不可用。尤其是像法國那樣的用科學方法製造敵人慘虐照相和繪圖的方法，這雖然得到一時的效果，不免留存永久的臭名；在另一方面更大足以降低被利用的報紙的報格和信譽。但就宣傳——特別是軍事宣傳——的性質上說，也有萬不得已的一事，就是縱然依靠真實憑據來宣傳，對於有隱秘必要的事情，也是應該隱秘的；縱在事實

上不能永久祕而不宣，但暫時的隱祕，是必要的。即如前述的克魯邸宅的宣傳，即使說沒有製造敵方的謠言，但不利於協約國方面的事情，一點也是不宣露的。再具體地說，比如某次我方戰事失利，若是立即發表，必定要使其它軍心受到影響；等到援軍開到，恢復已失的陣地，再行發表上次的失利，這便不致使其它軍心受到影響了。不過這種暫時或永久祕而不宣的方法，是一樣消極的宣傳方法，不是宣傳的真正目的。宣傳的真正目的，乃是要使這個宣傳的效力至少等於炮火的效力。即與築起炮火堡壘同時，還須築起宣傳堡壘。假若那戰爭是一種抵禦國際強盜的戰爭，或是一種弔民伐罪的戰爭，則做宣傳工作者的筆桿，當然都須一致地採取像槍桿一樣的姿勢。所謂『投筆從戎』一語，在今日說來，是應改爲『執筆從

戎』的。在『名正言順』，『理直氣壯』的原則之下去做爲國爲民的宣傳工作，是一定會收得美滿的效果的。

第二章 抗戰期間的新聞宣傳

一 首先要反敗北主義

兩年前，在一位現役報人銀絲君的訪餘漫談中，看到這麼一段：

每嘗自思：當此國步艱危之際，新聞記者之一支筆，直等於鄉人心目中之烏鴉叫，凡所報道，輒屬不祥。而近數年來，我人筆底下所渲染之新聞，實亦無可以慰藉人民。苟常此以往，永永如是，則國家前途，誠將不堪設想矣！有時乃亦自發願心，而深冀我人在不久之

後，可以將全國安定、失地收復、大舉慶祝之各種報道，以與國人相見；猜想實現之時，誠不知將若何觀忭。更有進者，我人輒見某國報章所載之皇國浩浩蕩蕩，日章旗翻飛照耀等等之語句，亦不勝羨佩彼邦之神武。苟國人而能當前醒覺，一致發揚我大中華民國之威武，則國軍浩浩蕩蕩，青天白日旗光耀亞東等等之氣概新聞，未始不可與強列各國，共同誇耀於全世界也。』

可是直到全面抗戰發動的今日，『國軍浩浩蕩蕩』的現象，當然到處皆是，但在我們的報紙上，可能看見這一類的記載或照片嗎？反之，『皇軍浩浩蕩蕩』的記載和照片，依然是填滿我們日常的報紙和圖畫增刊和一般畫報的篇幅。我們的報紙記載，爲什麼竟持這樣的消極態度？雖然我報界

中，大有喪心病狂甘願替敵方做宣傳工作的敗類存在，乃是原因之一，但畢竟漢奸記者居極少數，主要原因，我想還是中了敗北主義的毒。關於敗北主義的內容和害毒，在九一八國難發生後沒幾天陳豹隱發表的論敗北主義一文中，有數段說得好：

「（一）什麼是敗北主義呢？敗北主義，是政治學上的一個名詞。牠的內容：第一，是常把敵人的力量看得非常大，自己的力量看得非常小。第二，常取守勢，敵若不攻或臨到機會，便與敵人妥協；敵若攻時，則行退却。第三，總希望敵人內鬨不一致，或敵人自己破裂。敵人若不內鬨破裂時，則希望第三者來干涉，打不平。第四，希望敵人受意外的損失，盼天公打雷下雹子，把敵人打死。譬如對日本

吧，則希望日本地震，把日本來滅亡；或自己出一員猛將把日本人殺盡。第五，希望自己一點也不犧牲，不勞而獲。要知，凡是鬥爭沒有不犧牲不損失的，除非是不鬥爭。第六，無鬥志，雖口頭宣戰，但不作戰的準備。第七，主觀的勝利：自覺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不幸而敗，將來亦或勝；將來不勝，則精神上也受勝利！第八，本無鬥志，到了萬不得已，爲維持面子起見而戰，結果是失敗。這是敗北主義的內容。

(二)在最近抗日救國運動中的敗北主義：大家看看全國的報紙，我們的抗日救國運動中，敗北主義的那一點都有。譬如登着日本佔領瀋陽、吉林了，佔領牛莊、通遼了。不然是日本軍艦來到天津、青

島、上海了，漢口日兵登岸了，等等一類的話。日本兵的威風，是我們中國人給他宣傳鼓吹的。在我們之意，或在喚起國際注意，國民猛醒。但實際上，人人腦海中，都印上怕日本兵的印像。再按北平說，我在王府井大街，看見牆上貼着大字的標語是，「中國的領土被日本佔領了」大家想想，這不是敗北主義者悲哀的呼聲嗎！將敵人力量看得太大的呼聲嗎！

中國當這事件初發生時，是希望國聯來干涉，又希望美國來幫助，故成天總是國聯怎樣啦，美國怎樣啦。要知，自己沒力量，絕難得到人家的幫助。國際聯盟，根本沒力量，這是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的。譬如今次國聯通知日本十月十四日前撤兵，日本雖伴應之，實際

上不但不撤，反而增加。美國，現在的地位，亦無積極助中抗日的必要。世界上本無公理，亦無法律，如有的話，日本怎會用暴力強佔我的領土呢。希望第三者打不平，來干涉，這不是敗北主義嗎！

再看宣傳：我們宣傳日本此次暴行，是政黨爭奪內閣的問題，是日本軍閥的單獨行動。這消息是日本人在美國傳出來，以減輕國際上的視線的，而我們中國人便信以為真，拿來掩飾自己的愚昧和觀察不明的罪過。昨天報上登着，日本樞密院質問內閣說，「外人說我們表現得太亂，是內閣與軍人不一致，真的嗎？」內閣答，「不是的，我們很一致。」人家明明是一致，我們偏說不一致，這不是希望敵人內閣不一致的敗北主義嗎？

再說經濟絕交：光經濟絕交，也是敗北主義的表現，爲何不政治絕交呢？若政治不絕交，能收經濟絕交的效果嗎。要知經濟絕交所受的損失，政治上的勝利，是可以補償的。我們全國經濟絕交，日本所受的損失，在政治上日本現在東三省是可以補償的。我們僅只經濟絕交而不政治絕交，乃是信奉得印度的甘地的不合作主義，這不是敗北主義嗎！

反對直接交涉：凡世界上獨立的國家，除了保護國，那有不直接辦交涉而仰賴第三者來干涉的國家？我們希望國際，希望美國，這不是敗北主義嗎！最後，還有的人說，中國幸虧了無抵抗，不然，內地也布滿日兵了。要知日本沒理由，進兵內地，與各帝國主義者利益衝

突。日本在東三省的特別權利，國際上是承認他的。故日本之不進兵內地，本身力量及國際局面使然，絕不是因我們糊塗的中國人的無抵抗的緣故。

(三) 敗北主義的結果，是敵力日大，己力日小，將民意消沈下去，戰爭無準備，一戰則崩潰瓦解，國亡家敗。若求對內團結，必得對外強硬，這是人人所知道的常識。俾士麥想團結德意志人，才對法宣戰。故政治學上說，對外強硬，則內部團結，對外軟弱，則內部分裂。因此，知道採敗北主義，不僅因戰而敗，亦因內部分裂而敗。這是世界上一般的情形。但許多事，在外國是那樣，來到中國便變了質。敗北主義，能否來到中國也變了呢？我們看看我們對戰爭無準

備，不戰則已，戰則必敗。再，現在各方軍人皆一致對外，若政府不採強硬政策，久之，各方必然分裂。故敗北主義來到中國，仍然是敗北主義，並未絲毫變好些。」

因爲報紙——尤其是漢奸報——的編者在軍事（此處專指對外軍事而言）取材上持這樣的敗北主義，遂致養成在病理學上未有的『恐日病』！九一八國難發生以後的中國報紙，單就筆者常看的幾份報來說，關於我方抵禦侵略的報導，儘力抑制，而對敵方的侵略報導，則儘力替它虛張聲勢，恫嚇國人；這不僅在記事的本身上，即標題上也是如此。這種事例，每天都有，萬難盡舉，單舉出幾條較爲顯著的：

例 一

中國國民黨在九一八後的十一月，於首都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當十九日下午四全代表會開第五次會議後，中央社發出如下的一電：

『十九日下午開四全會第五次大會，主席團報告時，蔣委員中正代表主席團有重要報告。當時謝絕旁聽。茲探聞其要點如下：蔣首言自大會開幕至今，已歷八日。國難外侮，每日俱增。本黨同志，負有領導革命之責，亟應一致奮發，共謀禦侮。大會應本總理博大之精神，對於本黨具有革命歷史之同志，盡量容納，以求團結；尤應站在國民前面，積極擔負救國之責任，表示與國存亡之決心。繼謂希望各代表於選舉第四屆中央執監委員時，對於廣州同志提出之名單，盡量接受。又表示其個人決心北上，竭盡職責，效命黨國。當經全場一致

起立贊成。當時會場情形，極爲悲壯云。」

此電的最末一句，足以表示會場動態，何等重要，不料申報竟把它略去。又，此電文的重要性實超出一切同日的國內要電，而實應列入『國內要電一』欄的首條，而標以長行大字的題目，而申報竟把它列入『國內要電三』欄內即要電最末之一條，標題當然小之又小的；並且本應該在提要中特別標出，但却竟無隻字。這必然是因爲『紀載過於張皇，又恐激動人心，因之而引起意外之事變』（註一），遂施行『千斟萬酌』（註二）的手法的结果吧。

（註一）陳冷；申報二萬號紀念感言中語。

（註二）同上。

例二

一九三六年初間，我西南軍正式樹起抗日旗幟而大舉北上，這至少是一二八後應該特筆的事情。當時，從廣州方面發來許多性質相同——實行武力抗日——的路透電，其中並無何等像日方通信社稿那樣的挑撥離間的成分；在全面抗戰發動的今日看來，早已成了千真萬確的史實。但在上海只有幾張掛洋旗的晚報用大字標題登載這些電訊，而在素來主張「抗日救國」的中國的報紙上，都絕對看不到這種電訊，依然滿紙盡是代替我們正面敵人的虛張聲勢的情報——拚死命要做同盟社的喇叭！

例三

我們的報紙既然要做同盟社的喇叭，便應該對於同盟社所發的關於中

日兩方的電訊概行登載；但是事實上竟絕對不然，而且依然是在助敵方虛張聲勢的方針之下來選登同盟社的電訊。比如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我廬山會議所決定的全面抗戰，以及全面抗戰的軍事配備，這兩樁關係十分重要的事情，都由同盟社發出急電，登載十七日及十八日的東京各報上，上海的日文報大概也登載了。這種電訊，就中國人的立場來說，真是千載難逢的新聞報導，比諸路透社所發的西南軍抗日的電訊，讀起來實更足以振作我全國的民氣，興奮我全國的士氣；可是在我們的愛登同盟社電的上海各報上，却竟然看不見隻字！難道是同盟社專發東報而不發華報嗎？我想決乎沒有這樣的事，因為它是公開的新聞報導的機關而不是秘密的軍事情報機關的緣故。要而言之，不登這種電訊的理由，無非是同上例一樣吧。

例 四

更有一個上引陳文（一）項中所說的『盼天公打雷下雹子……希望日本地震，把日本來滅亡』的實例，就是九一八後三日（二十一日）時報號外的首條，標題是『日本大地震，上天示警』。發此號外翌日的時報上，當然更有關於這回地震的得意洋洋的記載。但就實際上說，這種記載，可有什麼效果呢？大書特書地登載這種帶着村婦咒罵口氣的報導，何如少登——或者一概不登——當時日聯和電通兩社所發的替日方虛張聲勢，並咒罵東三省抗日軍士為『兵匪』的電訊之為得呢？然而時報算真真的不覺悟，替日方宣傳一直繼續到八一三全面抗戰的發動以後，還是在公然登載着同盟電！

例五

關於上引陳文第二項第二段所說的『希望國聯來干涉，又希望美國來幫助』的實例，在五六年來的我們的報紙上，不知道有多少的數量；因爲這是人所共知共見的事情，所以不再在這裏羅舉了。單就第三段舉個最新的實例，就是前邊已經說到的八一三的前夜上海我方記者團去訪問川越，碰了釘子之後，所提出的書面問題。

在舉這個例以前，先敘一段事實。據八月八日申報本市新聞第一則『川越昨午到滬』的新聞所記，略云：

『……先是川越抵埠時，中外各報社記者，晤之於輪次。川越以未有準備，拒絕發表談話。我國記者團，當提出書面問題數點，要求

答復。川越轉飭清水與各記者約定當晚六時半答覆。嗣各記者準時前往其官邸，乃清水又以無暇接見爲辭，未有答覆。在此戰雲瀰漫之際外間忽又有和平空氣。此一國外交代表之行止，尤爲衆所注視。但川越曾自稱，是否卽行入京，現尙未定云云。蓋川越亦以該國軍人之蠻幹心理觀測，同時在該國大軍壓境之下，與我外交談判，一時殆無從開始，目前只得駐節滬上，以觀情勢之發展耳。」

在這新聞的後邊，便登有川越向它的御用機關同盟社的發表談話稿。暫且不要說在兵臨城下時的敵方外交使節對於我方新聞記者的玩弄態度，單說我方記者團在被玩弄後所發的「蓋川越亦以該國軍人之蠻幹心理觀測……」的推測，真算上了敵方軍事外交的大當。因爲預先懷着這樣的推測，所以

書面問題的第二問題便是：

「貴國外務省與軍部所取態度是否一致？」而狡猾無比的川越在向同盟社發表談話的次日，從容答覆此問：

「此種奇問，無須回答，蓋同一國家之機關，固無意見分歧之理。」

川越的這種答語，可以說是開門見山吧。真是如陳豹隱君之說，所謂外務省和軍部的不一致，完全是日方的一種對於國際間的詭譎的宣傳，用這做烟幕以圖達其侵略人國的目的。我東四省的被擄——特別是平津滬的被擄——要說都是這種詭譎宣傳的勝利，也無不可；而這種屢次失地的責任，我方的新聞記者——漢奸記者除外——是應該負其幾分之幾的責任的。

至於怎樣征服或革除敗北主義？這裏再引用陳文的結論：

『怎樣改革敗北主義？第一，全國上下，應認清敗北主義即亡國主義；第二，不但認清敗北主義，且進一步起來幹非敗北主義，將現在謬誤的宣傳等，重新改造一番；第三，要時時刻刻看看自己的抗日救國運動，是否走向敗北主義的路？』

非敗北主義是什麼？是進取主義，進取主義是什麼呢？第一，要知一切防禦，都與進攻有關，僅只防禦，絕不成功，應取攻勢的防禦；第二，對外要想內部一致，必得對外強硬；第三，要知自己不自救，絕無人救，即必先自救，然後人救；第四，全體民衆，應監督政府，指導政府，不得絕對的尾隨政府；第五，要知一切取得，必有犧

性與損失，天地間不勞而獲的事，是很少的，對日應具犧牲的決心；第六，要知非政治鬥爭勝利，絕得不到經濟上的勝利，工人想得經濟上的利益，必有政治鬥爭的罷工，因政治支配一切，故對日不光經濟絕交，還要政治絕交……第七，要知現在得不到勝利，將來極難得到勝利，普通我們說幾十年後勝利啦，那是妄人的幻想，現在失了東三省，中國內部再起分裂，將來怎能收回？第八，勿以日本得了東三省，在國際上失了信用，道德上失敗了。我們縱失了東三省，但是道德上精神上勝利了，這是敗北主義，不是進取主義，那有物質上失敗，而精神上反得到勝利的道理？」

這在目前和最近的將來，是可做我們報人的對外軍事取材的絕好指針的。

在八一三抗戰發動後，我們的報紙對於這個偉大的時代的蒞臨，在報導上是持着怎樣的態度呢？單就申新兩報來說，可說依然是走的敗北主義的路線：無中生有的戰事報導，每天都有，而千真萬確的敵方被擊落或焚燬的飛機以及俘虜的照片等，仍只讓一般臨時出版的畫報去登載，申新兩報是絕不登載的，它們所登的，幾乎全是敵方的轟炸或殘殺的「戰蹟」，這不是敗北主義是什麼？尤其令我們新聞學者所不能忘記的，就是上海，無論百事百行，要想對社會有所活動，都須預先請新聞記者吃喝一頓，才能給你登出新聞，不料担任這回偉大的對日全面抗戰的開始——八一三——的先鋒司令的就職新聞的登載，也須經過一回的「招待」——也須糜費幾多貴重的餉餼——真可痛心！這有十四日的申報的記事為證；正標題的

文句是『張治中任京滬警備司令』，副標題的文句是『駐滬代表邢震南等招待記者盼報界與軍隊聯絡共禦外侮』。記事的前半云：

『一二八戰役時充任第五軍軍長，指揮八十七、八十八兩師抵抗暴敵之張治中氏，現奉派任京滬警備司令官。張氏除已組織司令部外，並派邢震南、湯武兩氏為駐滬代表。邢湯兩氏，昨午假大西洋菜社招待本埠各報社記者，到數十人。席間，邢氏起立致詞，略謂我國為維持和平，對暴日之侵略，一再容忍退讓。此種苦心，舉世共悉。惟暴日貪得無厭，得寸進尺。自華北事變發生後，到處挑釁。本市亦發生虹橋事件，在我國竭力謀外交解決之際，竟大事增兵。今日復向我防地進犯，企圖擴大事變，我方為自衛計，不得已予侵略者以還擊。』

現在形勢已至最嚴重關頭。值此國難危急存亡之秋，必須全國上下，一致通力合作，尤盼新聞界同人與軍隊密切聯絡，共禦外侮……」

按張治中帶大軍到滬的消息，十二日的上海日文報使用大字標題登載出來；而我們的報紙吃了大菜，遲了兩天，才登出這麼一則不痛不癢的記事；而邢氏的『尤盼新聞界同人與軍隊密切聯絡，共禦外侮……』的話，更十足地襯托出上海新聞界在非常時期的消極的態度。在署名周公的所發表在「中日非常時期正告中日報人」文中有云：

『回頭再瞧瞧中國的報界，說也可憐。在這樣中日嚴重的局面中，簡直難以得見到他們的一兩篇的名言讜論。風平浪靜的，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像這樣的狀態，簡直是葺葺苟安，簡直放棄了他本身

爲民族國家服務的責任，更疏忽了報章爲溝通國際感情文化的先鋒。

如是而論中日的報人，一則金剛怒目，一則菩薩低眉，一則氣焰萬丈，一則垂頭喪氣，一冷一熱，一火一水……」（註一）

便是這個消極的態度的明證。而且尤其可怪的，就是中國報紙在我方被侵略的嚴重的局面中，對於我方的事，固持『水』的態度，而對於敵方的事，却持『火』的態度。這種事例，舉不勝舉，而較近的一例，便是受了狡黠的川越玩弄之後，還要一再地替他做虛偽的宣傳，已如前述。

又，筆者曾在我國報紙上發見爲了救國招待記事的事實，就是九一八國難剛發生後沒幾天（二十六日）的申報上曾登載一則『東北同鄉招待首都報界』的南京專電。就這個專電的反面看來，若是我一般新聞界對於救

國肯作『積極宣傳』，絲毫不成問題，當然東北旅京同鄉是不必再在流亡生活中挖出腰包做招待費了。但竟會有這樣的事實發生；更萬想不到又造下一個全面抗戰發動開始的大西洋菜社（以前爲救災等事也多是在此菜社招待記者）的招待記者的記錄！

對於我方抵禦侵略的情報，必待酒肉一番，才肯揭布，而對於敵方任意侵略的情報，縱然被餉以含有毒素的閉門羹也要揭布，替他宣傳，這不是真照戈公振所說的『飲外人之鴆毒以爲美』嗎（註二）？

（註一）詳見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上海華美晚報副刊報人園地。

（註二）詳見中國報學史頁三七九。

二 戰時新聞宣傳的要諦

我們對於戰事的新聞宣傳，縱然應極力排斥敗北主義，而在新聞的報導上，也不可一味地誇飾勝利而遮掩敗北。更申言之，一味誇飾勝利而遮掩敗北，這就原則上說，依然算是脫不掉敗北主義的軀殼。反過來說，不遮掩真正的敗北或劣點，這不算敗北主義，而將本應該用大字標題登載的我方軍事真實的活動，却僅以寥寥數語，排列到極不重要的地位，而對於敵方的一舉一動或在未動以前所放出的『揚言』『預料』『企圖』一類的空氣，都認為重要消息而列入當天新聞的首條，即遮掩我方的戰績，誇飾敵方的戰績，乃至有如後項所述，在標題文句的構成上常拿敵方做主格，

即看不起或不相信自己的實力，這才算是十足道地的敗北主義哩！這種事
例，單就八一三後的上海各報來說，每天都可以一眼看見很多。這裏特舉
一個筆者親眼看見的真實的實例：

例 一

九月十四日那天，雖然各早報的首條幾乎一致地登着『我軍自動撤至
第一道防綫』的大字標題的記事，其實，從那天上午起，敵方的海軍司令
部及其附近一帶，便在受着我軍猛烈的砲攻。所以午後出版的新聞夜報
上，登出這麼一段記事：

『十四日晨六時至八時，閘北自來水塔附近，時有炮火。華軍向
日本海軍陸戰隊本部開炮攻擊。八時至九時，日本海軍陸戰隊本部以

西，及北四川路日本學堂以北四分之一英里處，均曾受猛烈炮火之攻擊，似係由華軍陣地所發。九時至十時，江灣西北有斷續炮火；遠東運動場附近，有數處起火。」

雖然我們對於『似係由華軍陣地所發』的游移的語句，不大滿意，但畢竟這個報導沒有掩蔽住『華軍向日本海軍陸戰隊本部開炮攻擊』以及炮彈射程的事實。這原是第一特區工部局情報處在上午十時所發的消息，只是新聞夜報未曾註明。十時以後，在筆者寓處的露台上，望見東北方的敵司令部處起大火後的直衝雲霄的濃烟，差不多可說是開戰以來那方面未有的大火。看了新聞夜報，很怪它的『我堅守第一道防綫，敵數度進犯未得逞』這個用大號字的第一條新聞的標題，實不如改用『我軍猛烈炮攻敵海軍司

令部日本小學校以北一帶在延燒中』這樣的語句，較爲能夠引起公衆的注目，減少多少賣報者的呼聲。想不到第二天的立報竟把這件大事排到類似戰事瑣聞的『流彈·火警』的小題目之下說：

『昨日上午，遠東運動場附近，河間路、蘭路口，江灣鎮（淞滬鐵路西），天通庵日本海軍司令部附近，及北四川路寶樂安路口有火警。下午中興路、寶山路口、其美路、翔殷路口、橫浜路（近水電路）、商務印書館舊廠附近及靶子場附近有火警。』

已經燒到敵海軍司令部的背後和前面的炮火，這能以尋常的『火警』目之嗎？這顯然又是根據工部局的消息。工部局的發表戰事消息，就它所處的特殊立場說，實不能不持一種含糊中立的態度，故此處對於兩方戰地所起

的烽火，却大題小做地認作『火警』，毫不足怪。但就報社的責任和立場來說，採用這種消息，若是注明來源，當作一種官方消息，用極小字登於不重要的地方，原無不可；若是不注明來源而照樣登出或是節錄，這便有點不妥了。立報的編者正犯着了後者的毛病，遂致把一件大事，弄成瑣聞了！

例二

上例所述關係，雖然很大，但還不算多麼要命。這裏舉個最要命——要全中國人的命——的實例吧：平津淪落敵手，尙未克復，因此，從那裏發來的消息，無論是電報，是廣播，當然以反宣傳之類居多，即當然都是指兵爲匪，指我爲敵了。對於這種消息，只能認爲一種敵方宣傳文告；但

敵方的宣傳文告，照理不應登載。可是既如前述，直到對日全面抗戰的今日，我報界還有公然登載同盟社電的；更有不公然登載而以它做「專電」的根據的。姑退一步單就後者來說，若僅僅是政治上的普通事實，也不致生出大錯；但這種方法只適用於平時而不適用於戰時。戰時收得的敵方文告或情報只能留存在我方的參謀部裏。

閑言少敘。却說所謂最要命的實例，就是九月十五日立報上所登的標題『天津市匪多』的『天津十四日專電』：

『津市區及近郊，匪多如毛，敵特務人員等屢被槍殺。今日起，特務隊均發手槍。浪人在華界仍橫行，連日向租界搬家移物者甚衆。』

既屢次槍殺「敵特務人員等」，不顯然是我方當時報上常見的北方便衣隊或別動隊嗎？再不然，便是當地的民團了。「如毛」之數，雖不知幾多，但其爲大隊，可以想見。要之，此專電顯然是改造同盟社電，因爲這本是該報的專長，可惜改得不是時候；又此消息別報上有無登載，不知其詳，但就同盟社電的老主顧之一的申報來看，是沒有的。若是立報以別報所無，自己獨有而誇耀它的捷足先得，那是應受登載此電的前十日國民政府所頒布的修正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五條「於對外戰爭時，傳播不實之消息，足以擾亂治安或搖動人心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處分的。

就對於戰時新聞記事的鑑別即取材方法來說，還有一樁應特別注意的要事，就是不可拿新聞報導來資敵，明白點說，不可洩露軍情。統計從九

一八到現在，我們的在前方抗戰的鬥士，爲了在後方的新聞記者的隨便的洩露，不知道吃了多少的大虧。關於一二八戰期，爲這一點我方軍民所吃的大虧，以及報人們的盲目狀態，周公君曾在一九三六年夏天附於華美晚報刊行的『報人園地』上寫了一篇短文，說得很是透徹，因爲他差不多是持的『過來人現身說法』的態度。在八一三戰期，就理論和事實上發表關於這事的文字的，有本冊卷首曾經引用的鳴君的戰時宣傳工作的檢討的一時評，以及九月二十七日立報『言林』欄倪生君的慎重宣傳一文，都是有相當價值的文字。這裏特就鳴君的文中引出如下的數段：

『我們這次抗戰，文化機構積極的工作，非但動得極微，並且也覺得太無力；國內教育界、出版界幾陷於全部停頓；國外活動，仍未

能免臨時雜湊；再觀消極方面，竟缺乏組織和調遣，且對於缺乏常識的舉動，也未能加以制裁。姑舉一例論之，前數日，有某報用實地攝影傳遞火綫情報相號召，於無意之中，給敵人以情報，使我火綫將士，處於焦頭爛額的境地，幾致我神妙布局，完全逆轉，只爲了糊塗虫一紙相片而已！戰地一戰壕一大砲，原不足異，假若襯托了背境，烘染了蔭蔽，那麼敵人便可推算地位，測知藏集，加之現代立體戰術，就不難立時燬滅了。試觀虹口日本安置砲位，任何人不准窺探，又何等嚴密謹慎。近見十七日中央社路透電，美國新聞影片公司攝影員蒙根等，在京攝畢，即將趕赴中國戰綫後方拍攝戰場實況云云，不禁無限憂慮；然迄未見文化機構稍加注意，稍加論列，豈真見不及此

嗎？

我前方將士，保衛國土，殲滅強敵，種種可歌可泣的姿態，和當局設備戰地，配置軍力，種種情形，後方民衆和友邦同情人士，皆亟欲審知觀覽，愈詳愈受歡迎；一種熱忱情緒，亦固其宜；報人影人，盡力搜求，務使供應這種慾求的滿足，也無可非議。但應知戰鬥一方，欲知對方的狀況和布置，其千方百計需求的熱烈，更超乎我純粹崇敬和觀賞的情緒之上。故一篇形容盡致的戰地行紀，或一紙奮勇出擊的相片，我人讀了看了，不過感慕欷歔罷了。若使敵人得了，便發生按圖索驥的妙用，無意中便斷送了我火綫上的將士。筆下鏡頭，報人影人，豈不應有分寸？文化機構豈不應加急切的注意？

我軍政當局，近於前綫慰勞，已訂有限制辦法。甚望於戰況宣傳，無論文字影片，訂以條例，嚴格執行；事前的不令任便，自較事後的審查爲愈多多。這雖是一樁文化機構消極的作用，但未必不是發生積極效力的。因特提出商討之，願文化界多所努力。」

不過這種文字的效果都很微小，就是在報紙雜誌的記事和雜文中，依然儘量洩露軍情！其實，這不是關於一兩家報紙的問題，而是關於整個抗戰宣傳的問題，即不是一兩家報社應負擔的責任，而是主持整個抗戰宣傳的機構的人應負的責任。更具體地說，必須照鳴君所說的由「我軍政當局……訂以條例，嚴格執行……」這才能夠「發生積極效力」的。

以上是單就記事取材方面說的。再就記事和評論的製作上來檢討，一個主要的通病，仍是助敵方虛張聲勢，另外，如謬誤的主張和字句之類，更是不可勝述。這裏權且簡略地舉出幾個實在令人看不過去即忍不下去的實例：

例一

北平一被日寇擄去，自然要變成造謠生事、策動漢奸，毒化、奴化和走私的大本營，即變成黑暗愁慘的地方，絕對談不到什麼新局面，不料立報報告七月二十八日晚上宋哲元離平赴保的二十九日晨四時發的天津急電的末句，竟是『平市新局面，業已實現』，這是什麼話？

例二

凡是雙方砲戰的記事，我們的報人總是像記運動競技的點數一樣，一定要記出敵方所發的砲數。比如『向我軍某某陣地轟擊，達七八百響』或是『估計昨日敵機及大砲，轟擊，數在八百次以上』這樣的句子，是常看見的。不知那位記者先生是用怎樣的記數法——是敵方發一砲便記入簿冊嗎？一方面對於我方大砲——尤其是像在浦東方面的大砲——頻頻發出如雷鳴般的聲響（實在應用這種字眼來形容，單用『隆隆』字眼是不切合的），不是僅用『還擊』或『回擊』這種輕鬆的字句，便是用『砲聲隆隆』這種包括雙方砲聲的含混的字句。又，對於敵方的發砲更好用『猛轟』或『猛攻』的字句。如果真是敵方先行發砲，而且那砲真是猛烈，這猶可說；但事實上有決乎不然者。比如九一八六週年那天，我們的上海

陣——尤其是浦東——的砲隊大約是爲了紀念起見，在天一明便在一齊開砲先向敵方猛轟，隨後一直砲戰了一天。且不說使敵方所受損害的程度，單說由我方先行發砲，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而照當天的新聞夜報的記述，竟又是『我軍當即應戰，亦用重砲回擊；』幸虧在這條『本報消息』的下面，登有顯係上午十時工部局所發的消息，其第二段的首句寫的是『今晨六時半起，□□□之炮軍向東方猛攻……八時左右，有雙方炮隊開砲互擊，』否則這首先發砲的光榮，算完全又爲敵方佔去了。

更有過甚的一例，就是當十月廿六日從晚上到夜間我方空軍數次來滬轟炸，投彈之數，不亞於九一八夜間，當然敵方照例要大放其高射槍炮。但觀次日的申報上的記載，竟只有『……敵艦倉皇異常，紛以探照燈搜

尋，高射炮隨即砰然而發，聯如貫珠，惟我機均安然經過，每次炮聲持續約二三分鐘即止云」這種似通非通的專記敵方「砰然……如聯珠」的炮聲的記述。其實，在那「砰然」的聲中，是含有我機炸彈的聲音的，否則我機來滬多次的任務，豈僅是以敵艦上空「安然經過」爲目的？即使說在發稿前調查不出我機投彈的效果，也該聽見響聲，尤其不應該把我機向敵陣投彈的響聲也一股腦兒包括在敵方的「炮聲持續」中！這大約是因爲在編輯室內寫稿，玻窗並且關得很緊，聽不見的緣故吧。

又與專記敵方發炮次數差不多同樣的事例，就是在敵機轟炸之後，一定要像菜館開花賬一般開出轟炸清單，報告敵方轟炸的成績；尤其要命的一事，就是敵機某個炸彈擲得不中而離應炸目標只差若干米遠，這也要詳細

地報告出來，好使敵機下次改正它的目標，免得再行糟塌炸彈，同時，對於我機轟炸的成績，絕不注意向關係方面調查（敵方報紙當然不會像我方報紙那樣笨而給我們開出清單），多用『我空軍以任務已達，均安全返防』或『轟炸奏功，安然飛返』或『全部安返』或『予以重創後，安然飛返』或『我空軍……已達，乃從容飛去』這種模糊抽象的語句，聊以塞責之後，便永無下文了；假若不是有西報或各外國電社比較忠實的記述，我空軍轟炸的成績，是很難以顯露出來的。

例三

關於用字不慎致使記載與事實不符而且於無形中助張敵勢之例，實不勝舉；猶憶某次申報報告日寇侵熱河戰事的北平電的末句，是『日甲車因

我抵抗退朝陽』。這完全算是多用『因我抵抗』四字耗費報費事小，增加民族惰性事大；若是簡捷地用日『日甲車敗退朝陽』的字句，不是既然足以增長民族的勇氣，又復節省三個方塊字的報費嗎？

例 四

就是好登敵方散布的『揚言』或『預料』之類。查『揚言』或『預料』於何月何日進犯到何地何線，本是日寇慣發的誇大狂言、癡語。從九一八到現在，這種『揚言』和『預料』，敵方不知發了多少。這就日寇善於誇大的立場上說，原不足怪，獨怪我們的報紙實在千不該萬不該登載這種『揚言』和『預料』！這不僅中國報紙如此，西報也是如此。所以在去年國慶節過後，申報上記登一則正標題『西人投函字林西報撕滅敵方狂

語」側標題『十月十日諾言聞之齒冷連日作戰不利歸罪於天』

一個署名 Boted 的西人向字林報的投函，略云：

『余意諸人當憶日軍發言人曾豫料日軍能在十月十日以前，迫令華軍退出上海區域。華軍發言人則問所謂十月十日，何年之十月十日乎？日軍發言人所料日期，是否正確，姑置不問，而其竟如是安穩決定，使人覺其視戰事如友誼之足球比賽，可由雙方互相商妥，移早日期，或豫定日期。該發言人對於華軍撤退之時期，既似甚有把握，故吾人今日詢問其豫定日期是否可靠，當爲情理之所許也。……所可憐者，日軍今所處之地位，不能豫料一切，其於戰局，並無把握。假使日人能豫料一切者，（余之云豫料，當然爲合理之猜測，而非說夢

話。則戰事決不致延至今日矣。此種無意義之豫料，時入吾人之耳。余要求勿再發之，蓋聞之令人生厭也。在日人或視爲較爲重要，然徒使人對之齒冷耳……」

要之，敵方的這種『揚言』或『預料』，實在就是軍事宣傳上的一種虛張聲勢。這種虛張聲勢的軍事宣傳，至某程度是能收得對方心理的效果的；明白言之，就是也可以用這種『揚言』或『預料』去抑制我方的士氣。除敵方自己的報紙或中立國的報紙登載這種『揚言』或『預料』，是當然而不足責備的事情之外，我方的報紙對於含有這種『揚言』或『預料』成分的記事是應該立即予以撕燬的。

例五

分明是敵方用意甚明的動作，而我們全國的報人不知何故，竟好像約好了一般，時常使用『用意不明』或『用意未明』的字句來做電訊的結句，致把一則緊張的報導弄成弛緩的報導。關於這種包含莫名其妙的『用意不明』字句的電訊實例，筆者自從蘆溝橋抗戰發動以後隨便地收集，便不下數十則之多。爲圖本例的充實起見，摘要列舉數則如下：

『……日軍十七日又派卅餘人將津浦西站海關查驗所之房舍佔據，擬長期駐守西站，用意不明。』

『……宛平縣城外東北角之日軍復開槍向我城內攻擊……死巡警一人，傷十餘人……原因及用意均不明。』

『……日機五架一隊，不時在南市上空盤旋偵察，用意不明……』

「……福山口外在狼山港相近，泊有敵艦兩艘，惟離岸甚近，用意不明……」

「……敵機又在南市上空出現……向西沿滬杭路駛去，用意未明……」

這些不都是用意甚明而絕對用不着尋常的推測的事情嗎？要而言之，『用意不明』或『用意未明』這類的語句，除非遇着真真假假一般的消息，新聞記者是不可而且不必使用它的。

例 六

假若是在新聞記者『入睡』的時候所寫的記事，萬不可把『入睡』改成『入夜』以卸責任；但這種記事上的毛病，在八一三戰期的上海報界，

也是不勝其舉的。暫且舉出一樁最顯著的例，就是十一月一日夜間的滬西蘇州河沿岸一帶的劇戰。滬西的十餘天的劇戰，實爲八一三戰期中最劇烈戰爭之一役，而在一日夜間，尤爲劇烈，從晚上直到天明即筆者入睡的時候，各種的槍炮聲和吶喊聲還沒有停止，實爲八一三戰期所僅聞。但在翌日的大公報上對於那樣的劇烈的戰事的記載，竟只有這麼平淡的一行：

『蘇州河沿岸砲戰漸疎，入夜鎗聲亦少，全線頗爲沈寂，足證戰局漸趨穩定。』

這個『入夜』實在就是這位記者先生的『入睡』，而且他一定睡得很早，否則決乎不致聽不見那麼樣的劇烈的槍砲聲和吶喊聲吧。——照普通新聞學的原則，凡是夜間發生的在報社所在地的本市的事變，值夜的編輯和外

原书缺页

在記事製作上還有好多應矯正的毛病，如從敵人手中奪回自己的土地而不稱『克復』竟稱『佔領』，又對於一度被敵方侵佔說不定馬上就要克復（如廣德之類）的土地，居然使用『淪陷』或『淪亡』的字句。又，我軍皆有槍械而且有手榴彈、大刀等武器；但在記事中却常看見『我軍浴血應戰』或『我軍以血肉之軀……』的自己看小自己的文句！

例 八

以上各例多屬於技術上的毛病。另外在理論上還有一個重大的通病，就是對於在前線抗戰的勇士缺乏鼓勵。既如前述，我們的報人們對於我方軍隊的一進一退的地點都不怕洩露軍情，盲目地來作忠實的報告；但對於抗戰有功的勇士們的姓名，却竟一概持祕而不宣主義。再就另一方面去看

敵方的宣傳技術，恰同我們完全相反，即對於軍隊一進一退，除先期使用『揚言』或『預料』這種虛張聲勢或聲東擊西的詭謀之外，絕對不宣露它的地點；不但不宣露軍隊的所在，就是同盟社在戰區發報的地點，他們也是祕而不宣的；而對於侵佔某地的軍隊名稱及其將領的姓名，是必定要宣露出去的。前者是軍事手段，後者是軍事鼓勵。關於戰時宣傳的這兩個原則，日寇算是做到軍事與報紙圓滿聯絡的地步；但在我們，誠如十月二十日申報夕刊相君『瑣評』末句所說：『敵人宣傳本領，實在甘拜下風，我國眞望塵莫及！』要之，什麼事情都須要鼓勵和讚揚，軍心尤其需要鼓勵和讚揚。我們的報人，若是今後仍是不注意此點，必待有人『招待』——甚至到大西洋菜社吃大菜——這才能夠發表抗戰的新聞報導。這樣，我們

的抗戰前程，是定要受很大的影響哩！

×

×

×

這裏必得就抗戰期間我們的報紙社評，略加檢討；因為社評是比記事關係更爲重要的東西。

概括地說，在八一三抗戰發動後，單就上海報紙的社評來說，如申報和立報的，態度和立場都還不錯，新聞報的社評雖然常發揮所謂『過後見識』——比如在市中心區被佔後，它的社評中便會說『在國防不鞏固的都市中，從事於鉅大的建設，終感覺有些失策……』——但是這種社評雖然沒有益處，可是也沒有害處。最要不得的，而且必須在這裏取作檢討的對象的，便是上海大公報的社評。但是上海大公報與天津大公報同一系統，

所以它們的社評，原都可說是「一個鼻孔出氣」；因此，如欲檢討上海大公報的社評，必須首先尋求根源來檢討天津大公報的社評。在某小型報上，關於天津大公報的社評，有這麼一段的讚辭：

『大公報在華北最受一般人歡迎的，就是它的評論。大公報的評論顯然與各報的評論不同，它是能夠以銳利的目光來批評政治、經濟、社會……等重大問題，不像其他各報，有點評而不論，論而不評。所以大公報的銷數一大半建築在評論身上。說它靠評論賣錢，並不爲過。』

此論是可以作爲一般人的大公報社評觀的代表。因爲不但筆者常聽在北方的朋友們說大公報的社評好，並且即在『救國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樸校

訂、柳宗浩編著的書籍·雜誌·報紙處理法一書中，對於大公報（天津）的社評，也是說：『各報固有各報的特長與背景，如大公報即特長於評論……隱隱中而執有華北輿論界的權威』。可知天津大公報的社評是怎樣地爲人所稱許了。但是不幸運得很，我每向該報社評領教一次，便要大觸一次的霉頭。也許因爲不是該報的固定讀者，所以沒有看見過它的好社評；但我覺得單就偶然而又偶然地所看見的幾篇它的社評來說，也就夠做檢討的資料而有餘了。

書歸正傳：查我國所以受了九·一八和一·二八的禍變，主要原因不能不說是由於國共兩黨的不能合作即整個的革命戰線竟分成兩個互相對立的戰線。而這個革命戰線的所以分立即分化，最主要的原因是各帝國主義

——特別是日帝國主義——的挑撥。而各帝國主義的所以努力破壞中國革命集團，最主要的原因，無非想完成它們的『國際共管』的迷夢。對於這種十分明顯的情況，報人——尤其是社評的執筆者——至少應該用點新聞學的眼光來觀察，斷乎不可上了帝國主義迷惑的大當。然而萬想不到，竟在一·二八後的十二月，從一個北方朋友手中看到廿七日的天津大公報的題目是『何成濬入陝督剿徐向前』的社評。其前一半中，有這樣的妙句：

『……吾人試一披地圖，即可知徐匪月來竄逃之速，經過地方之多，無惑乎當局力飭追剿，務絕根株，以免後患也。……夫陝省頻年天災，民不聊生，人之爲禍，更甚天造。本報記者近曾視察陝南，據所披露之該縣負擔奇重，農民逃亡各情形，在在有赤化之感應性，而

青年學子，精神煩悶，思想簡單，浸潤於共產宣傳，歷有年所，雖小學兒童，亦竟高談該主義，尤見社會崩潰之可懼……」

其結論的口氣，尤其了不得：

「……由此觀之，徐匪如不澈底解決，死灰必有復燃之日，而解決之道，非由中央以實力督責鄂陝甘川四省，通盤防剿，斷無效益。憶前清白蓮教匪之殲滅，卽川陝鄂三省合剿之力，何成溶此次入陝，責任綦重，其善勉之。中央半年剿赤之功，能否不虛，繫於何氏此行矣！」

當時我從朋友手中借讀了這篇社評之後，骨頭幾乎都感覺麻木起來。除了在上引妙文的旁邊用紅鉛筆加以圈劃之外，並在文後附一句『注意你頭頂

上的倭飛機！」的評語，同時把這篇社評向朋友討過來，慎重而收藏之。雖然經過幾次遷居的磨擦，但到今日去覆看時，上記評語的鉛筆痕跡，還是隱約地看得出來的！從看到上述社評之後，過了三年，即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卅一日，又從上海大美晚報上看見標明「轉載天津大公報」的、題目是「防共歟？長共歟？」的妙論，它的開首說：

「近自西北共禍披猖，中外震動。中央政府既集重兵於陝甘，晉綏當局更有防共之組織，外人方面則甘省西籍教士，幾已全部退出，取道包頭，明日可達北平，日本軍部於共禍蔓延，更極注意，直接間接多所表示，尤置重於蒙綏一帶之防衛，甚至有將向中國提議共同防禦之報道；即日前在津集會之日本外交官吏，對於晉省共禍之危機，

據聞亦予以甚大之關心，可見此事殆成中外共同注目之焦點……」

看了這幾行，那末以下——尤其是結論——之說，不必再看，便可明白它的大致吧，即當然是不外乎請求各帝國主義國——尤其是對『晉省共禍』有『甚大之關心』的『日本軍部』——來同中國合作『防共』，否則便成了『長共』！距此論發表以後整整又過了兩週年。這時候，該報大約是真的害怕『頭頂上的倭飛機』的緣故吧。業已從天津遷到漢口，主要的原由，就是中國全國不但都不接受『日本軍部』的『甚大之關心』，來『防共』，而且竟然聯共『長共』，『赤燄彌張』（上評中語）地全面抗日起來了！也許是『遷地爲良』了？在八·一三後的十月三十日，從上海大公報臨時晚刊社評欄，題目下邊註明『見十月廿六日漢口大公報』字樣。此文

起首「段堂而皇之地說：

『這幾天，南北戰爭都非常激烈。依現勢推論，不論國際形勢怎樣演變，我們一定需要更堅苦奮鬥，更嚴重犧牲。我們加緊完成戰時應有的一切組織，要真正全國總動員，不如是，則所受的摧毀更大，而勝利更遠。』

比諸前引的兩評，真可說是天懸地隔了。以下仍是照『防共……』一評的作風，『貢獻』『第一』、『第二』、『第三』三條『具體意見』；在『第一』末尾的文句是：

『我希望一切向稱做左翼運動的人士們，把自己心理也都澈底改革過。從自己起，先拋除過去一切成見，亦不必再為瑣瑣理論之爭。

大家要認定軍事利益高於一切，要信任統帥，大家全力扶助之。要知道，祖國（原文如此稱呼『用意不明』）今天真在危急存亡關頭，應付這大戰，必須一切人都掬天良，拚生命，必須全國一切人一切事業都軍事化。在這期間，凡足以滅弱團結及互信的一切言論行動，都要力避。這樣好教統帥得以順利的專心應付這艱難困苦的戰爭。」

若是該報在三年五年乃至七年前能夠像這樣地『掬天良』來『貢獻』『具體意見』，也許河北數省不致失陷那麼快吧。不過這一段包括『掬天良』的社評的首句，實在帶着很大的語病，即『左翼運動的人士們』原都是吃着苦辛，拚着生命而去從事『左翼運動』的，實不能給他或她們戴上一頂真正天津造的徒有其名而無其實的『向稱做』這種帽子！而且『左翼運動』

的人士』的『心理』一向都不出乎『反帝抗日救國』的範圍，如今國共合作，全面抗戰發動，當然仍要推動這種『心理』到一般大眾的身上；若是叫他或她們『把自己心理都澈底改革過』，不是要叫他或她們立即停止工作去投奔帝國主義者做奴隸嗎？且慢，在『第二』中還有輕鬆奇妙的文句哩：

『……還有未經釋放的政治犯。這種現象，我們就認為費解。固然，政治犯形形色色，也許容有釋放之後不利於抗戰軍事之人。不過一般政治犯，大概是所謂左翼份子，這般人，對於抗戰想必不會有害……』

其實，『政治犯』之所以『還有未經釋放』的『現象』，在別的大眾們要說費解，是可以的，只有該報的社評執筆者，我覺得沒有『認為費解』的

必要；因為該報既然『執有華北輿論界的權威』者不知幾何年，所以至少在全面抗戰發動後，華北各地『還有未經釋放的政治犯』這種事實，該報以前的種種背謬的社評——尤其是上引的兩社評——不是在負着極大的責任嗎？假若該報這時候——在爲了躲避『頭頂上的倭飛機』而退出天津，放棄『華北輿論界的權威』之後——立即『掬天良』而『把自己心理也都澈底改革過。從自己起，先拋除過去一切成見』而不再發表懇求各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軍部』——來共同『防共』以免『長共』的足以亡國滅種的社評，那『未經釋放的政治犯』，自然是會恢復自由的。不僅止此，該報可說直到今日還不肯洗心革面，痛悟前非而『澈底改革』『自己心理』，否則真要主唱『全國更需要切實團結』和『釋放政治犯』，何不爽

爽快地來主唱，偏要吞吞吐吐地，扭扭捏捏地而且帶着一種陰陽怪氣的神情說出『也許容有釋放之後不利於抗戰軍事之人』的話，試問這是什麼話？下面的『不過……大概……』這一句的措辭，更是十分游移閃爍而令人難以猜度的說法；而且這一句同『第一』意見中的『我希望……』這一句是有着互相照應的妙用的。

回頭再看上海大公報的論調；八·一三抗戰發動沒有幾天，在某報充當軍事記者的R君偶然告我說它的社評唱出『已經得到精神勝利，可以不必再行抗戰』的怪論；但我沒有看見這社評，也沒有去尋找來看，所以這裏不提此事。爲圖直接了當起見，權且把我在從前年豐台事變後偶然——真真的偶然——在該報上所看見的兩個奇怪的『短評』，抄錄出來：

豐台又有事！

自從日軍在豐台修營房，駐兵隊後，與中國駐軍，已出過兩次問題，第一次交涉，果是我方另調兵隊換防，第二次彼方要求也有我軍完全撤退之說，其他條件，雖已辦妥，而撤兵一事，宋哲元氏迄未應允，人們都就認爲隨時可以出事。

昨晚又出了第三次的事。大勢比較嚴重，不能不認爲不幸之至。據一方報告，似乎宋哲元氏和日本的田代司令官都不願使事態擴大，我們但願其果能化大事爲小事，化小事爲無事，當此川越大使正在南京談判調整中日關係之際，從東亞和平着想，從無論中日那一方最後利益着想，我們都盼望這件事能從早和平了結。

——一九三六，九，一七日上海大公報。

空 氣

南北兩戰場的戰事正酣，九國公約會議就要開會，各方傳來不負責任的和平空氣。這種空氣即使出於國際的醞釀，在我們這方面，且可不必分這種心思。因為我們在戰，便須專心的戰，必須戰下去，且必須戰得像樣子，纔能談得到和。否則，投降而已，還談什麼和？參加九國公約會議的美國代表團昨日聲稱：「不應為休戰之建議，以遂日本瓦解中國中央政府之目的」。這話很要緊，我們應該加以警戒。

——一九三七，一一，二日上海大公報。

前一短評的要點是責備宋哲元不撤兵，遂致『豐台又有事！』並且主張

『調整中日關係』，其立意與前引的『防共歟？長共歟？』一評真可說是『一個鼻孔出氣』吧。後一短評用意實在莫測高深；其中的『必須戰得像樣子，纔能談得到和』的文句，尤其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再拿前一短評同前引兩評對照而觀，何以該報對內如彼之嚴，對外如此之寬？！就後一評說，『必須戰得』像什麼『樣子』？何以不明白說出？筆者在這裏，因為要照科學方法，不得確證，不能亂說，並且不能引用外間對於該報的『流言蜚語』，尤其不願『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就前一評的表面來看，該報是否有意向『日本軍部』『賣弄秋波』，希圖博取某種酬報，確實不能不說是個很大的疑問哩！又就後一評來看，那種游移閃爍的辭句，不是同上引的既援助而又指責的對『左翼運動的人士們』的辭句

一樣地適足以擾亂全面抗戰的統一戰線嗎？

讀者諸君或許嫌筆者在這裏檢討一個報紙的社評而不取社評，只取短評爲不滿足吧。的確，就是筆者，也感覺着不滿足。只是第一因爲既如前述，筆者上文所取的材料，都是偶然而又偶然的獲得，並非專門的蒐集；第二是這本冊子的篇幅有限，就這樣已經佔去不少的地位了。不過爲圖略加補充起見，給諸君指出一點重要參攷資料，也是筆者的責任。那末，就請諸君參看離騷創刊號上聶安君的並非春秋一文的『一』『三』兩項便夠了。

要之，社評是報紙的靈魂，即報格的表現，決非故意賣弄主張或文墨的所在。與一個人須有人格同樣地，報紙也是須有報格的。要想維護報

格，社評的主張，萬不可做效潑婦，一口兩舌，或是做效頑童，反覆無常。若是說爲着適應環境，不能不隨時改變一下，但最低限度也應該在立論和措辭上持較客觀的態度，像前引的大公報的數評那樣的像皇帝下聖旨或老子教訓兒子一般的措辭和態度，是萬不足取的。

關於新聞宣傳，還有一樁重要事項，就是標題字句的用法。既如上述，抗戰期間我國報紙的標題是不妥當的。這裏再就專替敵方虛張聲勢之一點上；來把不妥當的標題摘要指出。這本是中國報紙標題所犯的一個利害的通病，就是常把敵方的行動放置到主格的地位，很少把我方的行動放置到主格的地位。

先就七·八以後八·一三以前來找個例證。我們在廬山會議時，便已決定了全面抗戰，那末，在會議後的中日兩方的軍事戒備，自然是以同樣的緊張態度來幹的。報人們即使說怕「激動人心，因而引起意外之事變」，也應該把兩方的軍事戒備消息概不宣露，才是正辦，斷乎不應不登我方的戒備消息而專登敵方的戒備消息，即專替敵方虛張聲勢而抑制住我方的真實聲勢。但在事實上竟然不是這樣。比如在我方決定全面抗戰後一星期即七月二十五日的申報「本市新聞」的首條，登着大字標題的『日陸戰隊放哨戒備』的記事：第二例標題是『一時形勢頗趨嚴重。』照這樣標題看來，所謂『戒備』乃是日陸戰隊單方的行動；但在此記事（係通訊社稿）的後邊所附加的一段『本報記者』到閘北專訪的記事中，除了記述該記者被閘

北太陽廟分駐所警官因索閱記者證無有而暫時扣留的事情之外，又在末尾寫有這麼一段：

「記者談畢辭出，即由中興路向東巡視。馬路中三五成羣，竊竊私議，而沿途盤查甚嚴，尤以會文路鴻興路以及西寶興路而達青雲橋等處警戒更覺週密。」

這樣看來，這個記事的標題，不是至少應該改爲「中日軍警互相戒備」嗎？要之，這一例，不是那位外勤的責任，完全是編輯記者的責任。八·一三戰期，這種專替敵方虛張聲勢的標題，就更多了。仍先以申報作例，天天在它的新聞版第一面的那個糊裏糊塗的——帶有提要性質的——總標題上充分地表現着。既然是每天都有的事例，所以不能盡舉，姑且舉個經

我方軍事當局辯正過的事例，即九月二十六日的總標題，試照標題原則來分析這個糊塗總標題：可以看做正標題的兩行的辭句是『敵四次援軍開到企圖大舉來犯我決痛擊』；可以看做第一側標題的，是『雜店劉行我軍有相當進展』；第二側標題是『江灣開北砲戰外僅小接觸』；第三側標題是『我空軍夜襲猛轟敵陣地』。下面的首條記事並且也可以看做這個總標題的冒頭的記事，便是上邊第三側標題的所本，它的肩題和正標題的辭句是『我空軍兩度夜襲敵陣地』另加一個『轟炸奏功安然而返』的側標題。這是一則千真萬確的事實；而且這回我空軍的猛轟是何九·一八六週年那天的猛轟程度一樣的。特別是就新聞記事的要素之一的『距離的接近性』來說，這個真確事實的發生地帶，是從各報的屋頂到浦江和虹口的上空，離

報社再近沒有，而且當然爲全市公衆所共見共聞卽包含着做新聞記事又一要素的『著名性』。所以就新聞價值的原則來說，又就當日羅店、江灣的戰況來說，最低限度應用這件事的標題做總標題，而以原有的總標題代替這個第三側標題的地位，並應改其辭句爲『敵有四次援軍開到企圖總犯說』。卽後者完全是一種空氣，萬不可用空氣——尤其是敵人的虛張聲勢——來抑壓我方眞眞進攻的事實！果然，到第二天便經我方軍事長官把這個氣泡戳破了。就是二十七日的申報的記事提要中，有『據我軍高級指揮官談，敵第四次援軍將陸續開到，爲數四萬云云，詞涉誇張，而第四次總攻之說，亦屬虛張聲勢……』的辭句；寫這段提要的編輯者，大約會發生『早知今日，悔不昨日』之感吧。所以這天的總標題便完全爲我軍實際的

戰績；可是到二十九日，它的總標題，又替敵方虛張聲勢而爲「敵軍準備四次總攻日內又將展開主力戰」了！「又將展開」和「企圖大舉」，不是同樣的空氣性質的字句嗎？替敵方製造「總攻」或「總犯」的空氣，既經我軍長官辯明，何竟造了又造？觀翌日的勝利——尤其是傳偏世界的、十五那天陸空軍的由真正的「總攻」而得到的空前的大勝利——那兩星期前的敵方的「企圖大舉」和「又將展開……」的「誇張」和空氣的作用，不是可以不攻自破嗎？又就軍事常識來說，關於敵方的一攻一守的情報，非用精明強幹的間諜，決探不出，並且確是間諜們作報告的一個主要的目標，萬無預先向新聞記者宣布之理；即使公然宣布，也一定要嚴守着所謂「聲東擊西」或「虛虛實實」的鐵則，斷不會明白地說出。不料我

們的報紙的編輯們連這一點起碼的軍事常識都沒有！再不然便是依舊徘徊於敗北主義的路上！——我們的報紙的編輯者所上的敵方「總攻」空氣的，嘗同所上的敵方「和平」空氣的當是一樣的！

又在十月十九日的申報上，關於華北戰事，記載一則包括路透社十八日南京電，三則中央社十八日太原電，同樣地報告忻口方面我軍連日與敵激戰的很大勝利的事實。那知正標題的文句竟是「華北各線無激戰」，並且又是照着替敵方虛張聲勢的老手法，憑空加上一則絕對與電訊內容相反的「忻口敵軍砲轟我陣地」的側標題！

又某日申報有一標題是「津浦線敵總攻被我擊退」；近日大美晚報上有一標題排作橫式兩行「偽蒙軍窺東勝被馬占山擊退」的辭句，兩者都是

犯了以敵方爲主格的毛病。前一題若改爲『津浦線我擊退總犯之敵』或『我軍在津浦線擊退「總攻」之敵』，後一題若改爲『馬占山擊退窺東勝僞蒙軍』而去掉無謂的『被』字，這樣便算以我方爲主格了。要之，敵方氣燄日益高張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在我方報紙的記載——尤其是標題——上，過於替敵方虛張聲勢。

筆者嘗說我國門聯之類雖具標語性質，但內容表現多係靜態而缺乏動態，即多含消極性而少含積極性；一般中國報紙標題的表現，至某程度也可說是同門聯的表現一樣的。

二 注意敵方的宣傳——尤其是反宣傳。敵方的宣傳，當然有正反兩面。正面的宣傳，無非是虛張聲勢，沒甚可怕，最可怕的是反面的宣傳。

所謂反面的宣傳卽反宣傳的大原則，便是把敗說勝，把勝說敗，或是稱你爲我，稱我爲你；若是以日本語來表現，可說是一種『馬鹿宣傳』，因爲它的指兵爲匪一類的伎倆，是同指鹿爲馬一樣的。

然而這也難怪：在戰期，交戰者的任何一方所發出的公開的情報，無論是文電、是播音，內容都是同用兵一樣地持着虛實相反的主義。新聞編輯者若是不明白這一點，是最容易上當的。所以在發表一件戰事消息時，務須格外慎重；假若這消息是從我們當前的敵人方面發來的，這在根本上沒有相信或替敵人散播謠言的理由，除非是做敵方的間諜了。

講到敵方對華的反宣傳，近多年來，都是與它的武力侵略同時並進的。這種實例，若是一一舉出，必成一部很大的專書。故不必在這裏羅舉

了。

三 抗戰時期所必需的新聞報導

關於抗戰時期所需要的新聞報導，照筆者近年研究所得，分我、敵兩方，列舉如下。

1 關於我方的

(一) 前線我軍動態；但須略去防務實在情形，如陣地形勢等。從前內戰時，各報都儘量登載雙方防務的實在情形；因為這種內戰，無異叫民衆觀劇，故報紙不妨開出舞台狀況和登場脚色，但在對外戰爭時，是不需要的。

(二) 親眼看見——最低限度也要親耳聽見——的戰記，不要空洞無物的閉門造車一類的東西。但遇有前線歸來記一類的記事，可照前條的原則，節刪或加『××』號登出，否則容易惹起洩露軍情的禍端。

(三) 重要軍事長官會見記者之類，應附帶照相或題字，藉以表現其人的風姿和意志；如此可收壯我士氣、喪彼敵胆的效用。像『某師長會見記』這樣的隱蔽對象的標題；是不對的，因為這樣登載，縱有好的照相和題字，也都不能用了。但在記錄談話時，必須注意不要洩露軍情。

(四) 傷兵談話之類，雖可表白在他受傷以前的戰況，但易洩露

防務情形，用時務須慎重。

(五) 難民談之類，如係親身經歷、親眼所見的，在不宣洩我方防務情形的範圍內，可以採用，作為一種戰時軟性的記事。

又，九月二十一日立報上登有一則虹口區的難民談，內容是說在敵方防地的一個身衣軍服的日本商人，自動營救做他鄰居的某里中國居民，逃出戰區；並泣告我方難民說他有一子在羅店戰死，自己恐也不久於人世，言下露出無限的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情緒。這種難民談，是再好沒有的。總之，凡是表露出敵方的軍情，或某種弱點而足以使敵人看見氣餒的一切報導，都是需要的。

(六) 關於難民救濟事宜的報導；內容當然要注重到具體的實惠

的方法上。

(七) 對於戰士的救護和醫療的報導，因為除傷兵數目、受傷情形、救護方法乃至醫院名稱、地址等都須嚴守祕密，故可報導的事實，只有戰士們在療養中的生活——特別是戰士們所受的優良的看護和慰勞的情形（附帶照相）——以及他們對於戰事的感想之類，即使受傷戰士看見可以得到很多精神上的慰安，因而減少很多肉體上的苦痛的記事。

(八) 遇有重要的慰勞隊，比如從遠方來的慰勞隊，則應取該慰勞隊的人物、慰勞物品、慰勞的特殊行動——如演劇、唱歌等——為記事材料（附帶照相）。又在募集慰勞物品的團體中，難免沒有假公

濟私之流；對於這些人的行爲，也是應該暴露的。

(九)關於敵人的兇殘行爲，務取實見記，捨棄道聽途說之談；如係真確事實，則用『無理性有背人道』一類空話罵詈敵人，毫無用處，並且仍然算是蹈了敗北主義的覆轍，宜講求適當的報復之法，即報紙應儘量登載關於報復方法的獻議，這樣，才能使敵方有所危懼。但是我方的報紙，對於這一層，總是好登載空罵，而不採取關於報復方法的獻議。

2 關於敵方的

(一)敵方軍事配備及工事；在不替敵方虛張聲勢的範圍內，須盡力報導。

(二)敵方的作戰計劃；這是必須使大眾知道的事情。在我們的報紙上曾經屢次登載從敵方軍官屍體中搜得作戰計劃的消息，但始終沒有宣布出來。

(三)關於敵方死傷數目，特別是敵屍的處理等事，務必採取根據具體的事實的詳細報導，避免誇大的空話。比如帶有『敵衆傷亡累累』、『敵軍傷亡重大』、『敵軍死傷逾千，遺屍滿地』這一類的抽象語句的記事，多不足取；反之，如『被我擊斃之敵軍，查其番號爲第十一、第四十三、第四十六各縱隊』這樣的記事是有意思的。即前者的真實性很少，甚至於還多假造，後者縱然也沒有寫出死傷數目，大可使讀者自己推想。又就實際上說，敵軍的死傷數目，除在某小城

市包圍殲滅之外，是很難以得知的。更特別就倭軍來說，最怕人知道他們的死傷數目；但爲圖掩飾和隱瞞，更不能不造出虛僞死傷人名表或遺骨灰匣的件數等等以欺騙它國和自國的人。要之，關於敵方屍體數目和死傷情形的記載，實在是對敵作戰時期的最意味的新聞報導。比如以前屢次在偽滿邊界發生的蘇日衝突，關於由蘇方移交日方僅僅一兩具日兵屍體的事情，常做塔斯社發電的重要取材，便是這個緣故。

(四)我軍對於敵方工事的破壞情形，即大炮飛機炸彈的效果。關於這些事情，務須詳紀，而敵方的報紙或其它戰時刊物，可做良好的參考資料。

(五) 俘虜的姓名、人數、職位，以及審問情形、日常生活和談話、對戰事的感想等，可取俘虜的家書等做報導參考資料。

(六) 所獲敵方的戰利品，務須像記賬一般，詳細報導，單說『獲戰利品甚多』或『截獲戰利品不計其數』，是無意味的。

(七) 與軍事有關的敵方內部情形——尤其是所起的某種事變——務取實在材料，不要捕風捉影或無中生有之談。

(八) 在敵方的報紙上儘量採取關於敵方軍事失利的種種事實。

結尾的話

雖然因為冊子的篇幅實在太少，尚有許多關於抗戰期間的新聞宣傳的重要問題，都不能夠容納了，可是關於抗戰期間的新聞宣傳的最重要的問

題，大致都算說到。最後我引沈志遠的新聞抗戰論，以做本小冊的結尾。

「全面抗戰展開了：橫的方面，就陣線的位置論，有華北、華中、華南等各方面的抗戰；縱的方面，就陣線的性質論，則有軍事、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抗戰。要是不做這縱橫兩大方面任務的抗戰。那就不配稱爲全面抗戰。在這兩大方面所包括的各方面，本身又可分爲若干方面。很明顯的，例如橫的方面的華北戰線，本身又包括平綏、平漢和津浦各線；而縱的方面的文化戰線，本身又可包括教育、出版、思想、藝術、戲劇、新聞等等戰線。新聞輿論界的戰線，是縱的全面抗戰中的一面，而且可以說是極重要的一面，因爲現代的報紙，不單是簡單地應做「民衆的喉舌」，而且尤應積極地做民

衆意識的啓發者、指導者和組織者。因此，在目前全民族對敵抗戰正在開始的當兒，新聞界實負有異常重大的抗戰任務。

那末所謂新聞抗戰的實際任務究竟如何呢？

我以爲這個任務可以分爲消極的和積極的兩方面。消極的任務是報紙應該盡全力跟一切足以動搖和分裂我統一抗戰陣線的輿論和謠言，做嚴酷的鬥爭，務必使讀報的民衆不致爲敵人和漢奸的謠言所動，亦不致爲妥協派、苟安派的言論所惑……

新聞抗戰的積極任務是：報紙應當用一切方法，從一切方面去鞏固全面抗戰的陣線，督促和推動這次抗戰到它的「邏輯的終點」，以保障最後的勝利。譬如說，大家知道抗戰單靠軍事是不行的，必須要

發動全國民衆的政治總動員把民衆多方面地組織起來，訓練起來，發動起來，使之直接間接地爲神聖的民族抗戰服務；只有這樣我們的最後勝利。才有大半的把握。在這方面——在號召、鼓勵和推動（甚至指導）民衆運動的事業上，新聞紙實負有非常重大的責任。無論關於這方面的消息的露佈，新聞題目的標法，以及社論的撰述，都無不應具有號召和鼓勵的戰鬥性質。對於其它與保障抗戰勝利有極大關係的政策問題——如外交上的對日絕交與對蘇密切合作，內政上的健全抗戰的政治機構等——新聞紙都應當負起同樣的鬥爭任務來。總之，只一閱界及其他各方面的抗戰跟軍事的抗戰緊密地配合起來，我們的勝利才有保障。」（詳見一九三七年九月廿日立報言林欄）